

# “上海模式”的模仿与“北碚模式”的创造

## ——兼谈张瑾的《权力、冲突与变革》

赵晓铃

张瑾的论著《权力、冲突与变革》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史料丰富论证周详的学术专著，也是一本能够让许多重庆人感觉亲切的书，它的副标题是“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

在上个世纪那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10年间，重庆是怎样艰难地向现代化迈进的？这种艰辛的进程中，在军人们明明暗暗的权力争斗间，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有些什么样的先辈，他们是怎样争取人民的生存、地方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的呢？我们重庆人的爷爷祖爷爷奶奶祖奶奶在他们的花季里，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以什么为时尚？在我们山城两江的各个水码头，都堆积着些什么货物，要运到什么地方？每天又有些什么商品和物资从长江运进重庆，这些商品和物资在我们重庆人乃至四川人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我们重庆什么时候有了自来水，什么时候有了汽车，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有了电灯电话，还乘上了飞机呢？这本书都能告诉我们，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张瑾教授是师从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先生的博士，在读博士的时候，曾到美国访问，搜集了大量珍贵史料，尤其是一些过去相关研究中很少使用的外文资料，她还得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历史教授高家龙的指导。张瑾数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以学术会友，结识了美国学术界一些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颇有生气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研究视角、观点以及学术构架让她感到深受启发。张瑾的论著《权力、冲突与变革》所展示的只是一个城市10年的历史，但这个历史已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不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而是一部城市向现代化艰难迈进的开始阶段较为全面的历史。张瑾在传统史学微观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利用丰富的中外档案文献、地方史志，充分借鉴了中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将这10年的重庆置于近代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为中国城市多元发展模式的研究提供典型的内陆个案。她试图从理论上构建近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发展轨迹以及运行规律，提出了“从重庆发现历史”的思考。

我以为，张瑾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在同一个重庆的同一个历史时段出现的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由当时的重庆市长潘文华主持的颇具现代意义的市政建设，几年之间，重庆开辟了新

城区，修马路，建公园，有了电灯电话自来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出现了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馆，白日里有汽车在马路上行驶，入夜有霓虹灯闪闪烁烁，重庆也被时人称为“四川最摩登”的城市、有“小上海”之称。然而，这种对“上海模式”的模仿，也有外省人批评是“都市繁荣，虚有其表”。张瑾指出，这一时期，重庆的“城市病”较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1932年春，东北著名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先生来重庆宣传抗日救亡并做考察，一登上重庆的码头，就看到一家又一家公开的鸦片烟馆与妓院，随处是骨瘦如柴面如鬼魅的瘾君子，在大街上还能感受到军人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腐败，满街可见赤足敞怀衣履不整的军人，一位官太太出门便有三五个士兵为她抱孩子提包，这一切让杜重远感到惊讶和悲愤。张瑾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形成这种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这样的历史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些“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在迅速出现的高楼大厦和商业繁荣背后，在高科技生产下出现的贫富悬殊加剧，道德水准下降，犯罪增加、贩毒吸毒，以及难以遏制的贿赂公行和贪污腐败，甚至频繁的社会动荡。学者们注意的“拉美现象”或“坏资本主义”大体如是。

对于被逼着走上“赶超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来说，难道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么？难道就没有另一种发展模式，能够使落后国家在物质层面“赶超”的同时，吸纳传统与现代的积极因素，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重建文化与道德，造成一种新的富裕、强盛而健康的文明？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要什么样的发展？

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申报月刊》上展开过一场讨论，而我们重庆的一些先贤，当时用行动参加了这场讨论。这就是张瑾教授叙述的当时重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北碚模式”。

“北碚模式”是我们重庆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卢作孚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可贵创造。

卢作孚先生出生于下层劳动人民家庭，早年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风暴洗礼，也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激情燃烧，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又有认真理性的思考。他很年轻的时候就通过长江去到上海求学，对“上海模式”并不完全认同，对这个西风东渐的第一个中国登陆点、迅速地畸型繁华的城市，他有全面的认识，对后进国家容易滑入的“坏资本主义”已有警惕。他重视学习上海的城市建设与科学技术，也引进江南先进的教育。张瑾认为，卢作孚是能够突破20世纪二三十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的关键人物。卢作孚和他的朋友们创造“北碚模式”在当时的重庆“颇具独创性”，“北碚建设远远超过了乡村建设的内涵，成为研究内陆中国现代化的典型个案”，“北碚模式”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吸引新的经济事业，卢作孚先生任总经理的民生公司，相继在此间投资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并促

成洪济造冰厂等企业；另一方面，北碚在建设之初就创办了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体育场、温泉公园、平民公园、实用小学、嘉陵江日报馆等，以后又建立了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等等社会公共事业和科学文化机构。

应该提到的是，在此期间，北碚建设的经费相当困难，而民生公司还在草创时期，到这一切初具规模的时候，民生公司不过刚刚拥有三只小轮船，并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北碚始终重视对人的现代教育，卢作孚在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建设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的过程中，北碚实际上成了一个教育训练人的基地，现在一些 90 左右的老民生职工还记得在他们青少年时在北碚接受的严格而有意思的训练，他们认为卢作孚先生是他们终身的老师。北碚的教育，尤其是民众教育极有特点，卢作孚训练的士兵就是民众的教师，他们常常利用民间传统的节日，将整个北碚做成一个快乐的课堂，让民众感受到现代的观念，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与表面繁华的“小上海”重庆市区相比，没有高楼大厦的北碚街道清洁整齐，人们俭朴而奋发，热爱集体活动，有公德心。

在重庆市感觉沮丧的杜重远，在北碚却耳目一新，非常兴奋，说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他的观察和体验后来以通信的方式刊登在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上，他对北碚模式的创造者卢作孚先生的评价令人难忘，说卢作孚“思想缜密，眼光锐敏，处事勤奋，持身俭约”，并说“弟之来川，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

1932 年，中国佛教学会会长太虚大师参观北碚后，以“建设人间净土”为题做了演讲，认为北碚的建设成就证明，佛法上所谓净土之意，不必定在人间之外，人间亦可造成净土。

1934 年，曾游学东洋西洋的银行家张公权来四川考察，认为北碚是“川中之洞天福地”，“世外桃源”，看到卢作孚训练的青年的精神面貌好，感动得流泪，赞扬卢作孚“努力精神建设”。

见多识广的教育家黄炎培是卢作孚的老朋友，1936 年来到北碚，非常欣喜，说“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而这名满天下的北碚是人创造的，所以他接着说，“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

张瑾说，“北碚建设与重庆建设几乎是同步的，其结果却形成不同的风格和风貌”，“如果说刘湘 21 军对于‘上海模式’是模仿其物化的层面，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则是从人的现代化的层面突破了简单的追赶上海的误区”。可见卢作孚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发展理念是经济与文化并举，实业与教育同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北碚的经济与文化并举，并非并重，从很多历史的细节上可以看到，两者的关系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而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后发展同家和地区，如何在落后很多的情况下“赶超现代化”，卢作孚先生决不主张以

道德，包括传统美德的失落为代价去追求高速度，但他又有强烈的紧迫感，十分重视效率，他多次讲演说，中国人有两个武器——“勤”与“俭”，别人做不到的“勤”与“俭”，我们做到，我们就能赶上。他的一个名言是：“大胆生产，小心享用”。他领导的民生公司，多年没有给股东分红利，却不断地发展生产，他个人一生艰苦奋斗朴素节俭的作风也是在实践这一发展理念。

看到张瑾的这本专著，我不禁想起和她——一起在重庆图书馆里查阅民国时期出版物的日子。每天开馆时，我们常常第一个走进阅览室，中午，我们在图书馆门外的小店里吃一碗米粉——那种素米粉真鲜呀——然后又进去接着看。（谢谢重庆图书馆文献中心常常派人在中午专门为我们值班！）直到下午图书馆关门，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些发黄的旧书报散发出一种过去的味道，令我们如痴如醉。而张瑾已在这里查了十好几年，那时，她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就地沉浸在这些民国出版物中。早先图书馆一天收2元钱的查阅费，她完全是自费，管理员大姐感动了，说，小张，我们优惠你，就交一元吧，就这一点优惠，张瑾至今心存感激。张瑾说，你觉不觉得，在这里读书，真享受呵。是的，真是非常享受，那真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历史现场，一走进去，就不想出来。

《权力、冲突与变革》被南京大学评为优秀博士论文、学术价值相当高。但我常想，如果张瑾是作家就好了，她的书便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而面对这样的学者，一个认真负责的作家是会汗颜的。

张瑾在自己的书中，把自己思想认识的产生说得很清楚，她不但感谢自己学校里的导师，美国的导师，也谢谢给过她启发的所有朋友；不但引用别人的成果在注释中说明，连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受到什么人谈话的启发也写进自己的著作里。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规范。这种规范是与国际接轨的。去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人田中，对自己获奖非常意外，因为他获奖的那篇文章已发表了二十年。原来是两个西方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却公开说，他们是受到田中二十年前一篇文章的启发，才做了这项研究出了成果，没有田中的理论思考，就没有他们的实际成果。这就是促进和保障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学术规范，这就是诚实。

中国有位老作家，二十年前提出“作家学者化”。我想，这个“化”，也应包括学术规范，如是，便不会有那么多丢人现眼的著作权官司。